

宋元间中斯文化交流

薛克翘

摘要：宋元时代，中国与斯里兰卡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迁，但两国间的海上交往却始终通畅，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友好的牢固纽带。在此期间，不仅有政府间的交往，也有民间的商贸往来，两国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就海上交通而言，广州—斯里兰卡和泉州—斯里兰卡是两条主要通道，《宋史》《诸蕃志》等文献有相关记载。就宋代中斯文化交流而言，由于资料甚少，人员往来情况稍嫌不详。不过，《宋史》卷四八九《外国列传五》和《佛祖统纪》中的相关记述很能说明问题，既有关于人员往来的，也有关于物质进出的，是宋代时期中斯文化交流的实证。元代时期，中斯文化交流有大发展，《元史》有很多记述。人员方面，既有政府使团交流，也有个人交往，还有外籍人士参与。中国的汪大渊、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阿拉伯的伊本·白图泰都是这一时期与中斯文化交流有关的著名人物。这时期的物质交流也很兴盛，中国输入斯里兰卡的物产主要有丝绸及丝织品、瓷器、铁器等，斯里兰卡输入中国的物产主要有大象、犀牛、香货、药物等，可谓品种多样。总体说来，虽然这期间中斯文化交流稍弱于中印文化交流，但却很值得认真研究，不仅有利于回顾友谊，而且有利于当下中斯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斯里兰卡；文化交流；影响

收稿日期：2020-08-28

作者简介：薛克翘（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印度文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佛教。

在中国古籍中，斯里兰卡有许多译名。宋元间（960~1368年）的中国古籍称斯里兰卡为细兰、悉兰池（地？）、西兰山、细蓝，或为僧伽耶山、僧迦（加）刺、细轮叠、新合纳的音（普？）、信合纳帖音（普？）、星哈刺的威等，有时也称师（狮）子国。

一、宋元间中斯海上交通

(一) 从广州到斯里兰卡

1. 北宋时期

《宋史》卷四八九《外国列传五》有《注辇》条，说：“（注辇）国东南二千五百里有悉兰池国，或相侵伐。”说出了斯里兰卡与注辇的相对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政治关系。注辇（朱罗）国当时的首都在建志（Kanci），即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之康契普拉姆。说从建志到锡兰的距离有“二千五百里”^①，显然有误。但“相侵伐”是准确的。同条又说：

三文离本国，舟行七十七昼夜，历那勿丹山、婆（娑）里西兰山至占宾国。又行六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至古罗国。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昼夜，历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宝龙山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塚，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离本国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焉。

这里给出了从注辇到广州的航行路线、里程和时间。近百年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记载有诸多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此记载看似具体，但航线、里程和时间都不准确，甚至混乱。尤其难以考证者，是沿途的那些地名。

近期，周运中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广征博引，对这段航线重新予以考证，基本考定了其中的地名，厘清了这一航线，并绘出航路图。^②

其中，娑里西兰山即锡兰。因此，这段记载既是朱罗国与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也可视为锡兰通中国的航线。

2. 南宋时期

南宋周去非（1135～1189年）《岭外代答》撰成于1178年。其卷二《外国门上》有《海外诸蕃国》条，写道：

西南海上诸国，不可胜计，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趾定其方隅。交趾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安也。交趾之西北，则大理、黑水、吐蕃也。于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细兰。细兰海中有一大洲，名细兰国。

^① 印度长度单位中没有“里”，此处不知如何换算得来。

^② 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257页。

这里指出了锡兰的大体方位。说明当时人认为大理等地以西的“大海”即是今天的孟加拉湾。这个“大海”当时被称为“细兰海”。这恐怕不仅是南宋人的称呼，大约阿拉伯、南亚和南洋的许多商人和舟师都如此称呼。

其卷三《外国门下》有《西天诸国》条再次提到“细兰”和“西兰海”。而此处的“西兰海”似乎仅指锡兰周围的海域。

无论如何，锡兰通中国的航线是确实存在的。

赵汝适（1170~1231年）的《诸蕃志》成书于1225年，比《岭外代答》成书晚47年，也具体记载了海上交通的航线和所需时间。

3.元代

尽管我们一时还找不到元代海上交通线的有关描述，但元人在宋人的基础上保持着海上交通的顺畅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在元代，无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各国政府间的使节来往，还是商业贸易，都十分繁荣，这是有足够史料可以证明的。

（二）从泉州到斯里兰卡

1.宋代

《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条指出：

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

也就是说，当时有一条航线，从阿拉伯或南印度经锡兰可到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占碑一带），再从三佛齐到中国的广州或泉州。

在唐、五代时，泉州已是通商口岸。北宋时泉州更是重要港口城市，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诏置市舶司于泉州。南宋时，泉州港的贸易已十分繁盛，其地位已得到进一步提升，所以《诸蕃志》中频频提到泉州港，通往细兰国的航线也记载得相当清晰：三佛齐“在泉之正南，冬月余方至凌牙门（在今新加坡海峡）”“从三佛齐……五日水陆到蓝无里国（在今印度尼西亚亚齐）”，从蓝无里国“北风二十余日到南毗管下^①细兰国。自蓝无里风帆将至其国，必有电光闪

^① “南毗管下”，意思是当时细兰国在南毗国管辖之下。南毗国的地理位置，据前人考证，在今南印度喀拉拉邦的卡里卡特一带。见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69页注释（2）。今考南印度和斯里兰卡史，12世纪后期，朱罗王朝衰落，半岛南端的潘迪亚王朝开始壮大，并不断袭扰斯里兰卡。到13世纪，原朱罗王朝的南方国土已被潘迪亚王朝占领。此时所谓的南毗国，应属潘迪亚王朝。而所谓的“南毗国管下细兰国”，应指潘迪亚国对斯里兰卡的管控。

烁，知是细兰也”。

《诸蕃志》的记载虽然也有不准确或自相矛盾处，但大体清楚，所过各地也基本可考。

2.元代

有了宋代的航行经验，元代从中国到斯里兰卡显得顺风顺水、轻车熟路。尤其是蒙古人征服了中亚和西亚以后，所建立的四大汗国中有三大汗国控制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要道，而元朝作为四大汗国之一则与之形成呼应，在海上丝路称雄。元廷出于各种目的屡屡派出使者出使南亚诸国，泉州往往是使者们的始发港和返回港，斯里兰卡也成为其目的地之一。

元廷的使者们去斯里兰卡所肩负的使命有时很简单，要么是为了瞻仰佛钵和舍利，要么仅仅是为了买药。所以，尽管元朝统治的时间很短，但派出使团前往斯里兰卡的频率却是史上最高的。

二、宋代中斯文化交流

（一）人员往来

两宋时期中斯文化交流的情况，由于资料甚少，我们所知不多。仅北宋期间有几则记载与中斯人员往来有关，而且都是海外人员来宋，却没有宋朝使者出使斯里兰卡的记录。《宋史》卷四八九《外国列传五》记载：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注犍国王罗茶罗乍^a“遣专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来贡，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使者娑里三文^b等“又献珠六千六百两、香药三千三百斤”。

天禧四年（1020年），注犍国又遣使“入贡”，使者病死广州，皇帝诏地方官善待从者，送之归国。

明道二年（1033年），注犍王尸离罗茶佗罗注^c又“遣使蒲押陀离等以泥金表进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两、象牙百株”。

① 罗茶罗乍（Rajaraja，约985～1014年或1016年在位），朱罗国王，史称罗茶罗乍一世，在位期间曾征服南印度诸国，并占领斯里兰卡北部地区。

② 娑里三文，根据其读音，“娑里”对Soli，即注犍，似无疑，但“三文”对音殊难定论。或疑为“沙门”对音，恐非。理由是，《宋史》明确记载其为官员；当时注犍人笃信印度教，国王尤甚，而沙门则指佛教和耆那教出家人，佛教早已在注犍遁迹，即便有极少耆那教徒在，亦难被委任。

③ 尸离罗茶佗罗注（Shri Rajendra Chola，约1014年或1016～1044年在位），朱罗国王，罗茶罗乍之子，在位期间朱罗国势最盛，曾远征孟加拉，并将斯里兰卡和三佛齐等地纳入朱罗国版图。他维持了南洋贸易的繁荣，曾两度遣使来华。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注鞞国》条及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注鞞国》条所记可与此相印证。其时，因斯里兰卡被注鞞统治，故注鞞国使来宋，也应代表斯里兰卡。

《佛祖统纪》卷四十四记曰：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南海注鞞国遣使来贡，进天竺梵经。其使言，四十年以来海无风涛，意中国有圣人出世。九年二月，北天竺优填曩国沙门天觉、南天竺师子国沙门妙德、西天竺迦蹉国沙门等来。各进舍利、梵经。各赐紫衣、金币”。这里所谓“南天竺师子国”，亦反映了当时斯里兰卡被注鞞国统治的史实。而妙德（梵名应为Suguna）来华，则是一次中斯佛教交流。

《诸蕃志》卷上《细兰国》条详细记载了细兰王的形象、装束、起居习惯及宫殿的奢华等：“其王黑身而逆毛，露顶不衣，止缠五色布，蹑金线红皮履，出骑象，或用软兜，日啖槟榔，炼珍珠为灰。屋宇悉用猫儿睛及青红宝珠、玛瑙、杂宝装饰，仍用藉地以行。东西有二殿，各植金树，柯茎皆用金，花实并叶则以猫儿睛、青红宝珠等为之。其下置金椅，以琉璃为壁。王出朝，早升东殿，晚升西殿，坐处常有宝光，盖日影照射琉璃，与宝树相映，如霞光闪烁然。”也记载了当地人的习俗，如“以纒缠身，露顶跣足，以手掬饭，器皿用铜”。还有当地的山川景物，“有山名细轮叠，顶有巨人迹，长七尺余，其一在水内，去山三百余里。其山林木低昂，周环朝拱”。这些记载大体准确。若非目睹，难能详述。诚然，并非赵汝适本人目睹，但必有中国商人亲履其地，将有关信息转达于他。所以也可以说，正是这些无名的亲履者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二）物资交流

1. 中国物产

宋代输往斯里兰卡的主要中国物品为丝绸、瓷器和铜钱。如《宋史》卷四八九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注鞞国使者二十七人“来献”，神宗“各赐衣服、器、币有差”。其中“衣服”属丝绸制品，“器”主要指瓷器，“币”主要指铜钱。类似的记载相当多，不必一一列出。

《诸蕃志》卷上《细兰国》条说：“番商转易用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为货。”其中，瓷器肯定是产自中国，丝帛也主要产自中国。由于瓷器不易腐烂，所以斯里兰卡现代考古中多有发现，而丝绸及其制品在斯里兰卡不易永久保存，则较少考古发现。

如斯里兰卡学者所说：“在斯里兰卡发现的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白瓷主要是唐、宋时期的，而且在斯里兰卡北部海岸和西北部内陆遗址的宋代地层中也发现了宋代的高质量青瓷。”“这些宋代陶瓷揭示了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贸易

关系，当然还有中国同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①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至康提市之间，克格拉（Kegalla）镇南8~10公里处，有一座佛塔。1947~1954年，在对该塔进行发掘和修缮时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宋代瓷器碎片，其中最早的是10世纪前后越窑系瓷碗残片，其次是12~13世纪南宋龙泉窑青瓷碗残片、青白瓷柑子形小罐和四足小香炉的一部分，以及广东、福建一带烧制的黄釉四耳罐残片等。^②

在斯里兰卡北部重镇阿努拉达普拉市东南约10余公里处的雅帕护瓦（Yapahuva）遗址，1911年和1949年曾两度发掘，除发现有中国两宋和元代陶瓷外，还发现有1364枚中国铜钱。这些铜钱大多是两宋之物，也有若干唐代的开元通宝和一枚元代的至元通宝。这些文物现收藏于阿努拉达普拉博物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12世纪南宋龙泉窑制造的完整的青瓷碗，口径为21厘米，高9.3厘米，外面饰有仰葵瓣纹，属罕见珍品。还有两件修复后大体完整的宋代青白瓷碗、一个橄榄色青瓷小狮子的头部和福建一带烧制的白瓷片、宋三彩的满绿釉长罐等，都是12~13世纪的东西。^③

2. 斯里兰卡物产

《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均记有中国商舶去南亚经商和南亚物产的情况。尤其是《诸蕃志》卷上，详细记载了细兰国的物产：“产猫儿睛、红玻璃、脑子、青红宝珠，地产白豆蔻、木兰皮、粗细香。”记南毗国及其属国物产，有真珠、诸色番布、兜罗锦（锦）、猫儿睛、椰子、苏木等，亦应为斯里兰卡物产。中国商人既然到那一带从事贸易活动，自然会把以上物产贩运回中国。

三、元代中斯文化交流

（一）人员往来

1. 政府使团

《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列传三》记印度及锡兰等国曰：“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比余国最大。元世祖至元年（1273~1294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诏谕诸蕃。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余俱蓝诸国未下。”“十六年（1279年）十二月，

^① 贾兴和：《斯里兰卡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以出土中国陶瓷器为中心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② 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2页。

^③ 同上，第132~134页。

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国主必纳的……言来岁遣使入贡。十月，授哈撒儿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谕。十八年三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四月，至马八儿国……以风阻不至俱蓝，遂还。”“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二十年，马八儿国遣僧撮及班入朝……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文中，马八儿（Mabar）即印度半岛南端东侧沿海一带；俱蓝即今印度半岛南端西侧之奎隆（Quilon）；僧伽耶山即锡兰。

《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命亦黑迷失“使海外僧迦刺国，观佛钵舍利，赐以玉带、衣服、鞍辔。二十一年，自海上还。”僧迦刺国即僧伽罗国，即锡兰。

《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记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十一月，遣左吉奉使新合刺的音。卷十七《世祖本纪十四》记：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信合纳帖音国遣使入觐。至元三十年冬十月，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出使南亚三国，其中包括信合纳帖音，赐其酋长三珠虎符。此处的新合刺的音和信合纳帖音国均为巴利语Simhaladipa之音译，即僧伽罗岛。

2. 马可·波罗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随父亲和叔叔经过长途跋涉，于1275年5月到达元朝上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他在华17年，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1292年夏天，他奉命护送公主阔阔真去伊朗，自泉州港出发，循海路前往伊朗。完成使命后，他与父亲和叔叔西行返国。

《马可波罗游记》就是根据他的口述记载下来的一部极具历史价值的奇书。该书第二卷末尾，不仅描绘了刺桐（泉州）港的交通和贸易盛况，也讲述了德化瓷的制作工艺。更重要的是，书中介绍了从泉州到伊朗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情况。在第三卷第十四章，特别介绍了锡兰岛的面积、国王等情况。在讲到物产时说：“除了大米和芝麻之外，不产任何谷物。芝麻是用以榨油。他们的食物是乳、大米和肉类，所饮的酒取自树上……这个岛所产的红宝石，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美丽、更有价值；同样，还出产蓝宝石、黄宝石、紫水晶、石榴红宝石以及其它许多贵重的宝石。”^①在第十五章，介绍了锡兰人的佛教信仰情况，提到了释迦牟尼的事迹，还提到了佛牙、佛发和佛钵。说“怀着这种信仰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来到这座他（指释迦牟尼）所埋葬的山岳去朝圣。他的

^① 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页。

一些毛发、牙齿和他所用过的面盆，现在仍然保存着，并且通过各种仪式陈列出来”“碰巧发生在一二八四年，大汗（指忽必烈）……想要弄到这些遗物而垂涎三尺，于是，派遣一个使节团向锡兰君主提出要求。他的使者，经过冗长乏味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从这个君主那儿获得两个大牙齿、一些毛发和一个美观的青石容器。当大汗接到使者们带回这些有价值的珍品将要到达的消息时，他命令汗八里（Kanbalu）全体人民，倾城出迎，并且以极为壮丽和庄重的仪式，把他们引导到他面前”。^①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涉及一段公案。马可·波罗所说的时间是确切的，与《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的“至元二十一年”相一致，而且言之凿凿地说使者（亦黑迷失）带回了佛牙、佛发和青石容器（盖指佛钵），并且说忽必烈举行了庄重的仪式迎接佛牙。但是，《元史》中记亦黑迷失去斯里兰卡是“观佛钵舍利”，并没有带回佛牙等物，也没有记忽必烈迎佛牙事。《元史》同卷又记：亦黑迷失“二十四年（1287年），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献方物”。一次是去“观佛钵舍利”，三年后又去“取佛钵舍利”，而且去的不是一个国家，为什么？难道马八儿国还有另外一份佛钵和舍利？这个“取”字又当作何理解？

考察一下斯里兰卡的历史，问题似不难解答。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1284年也恰巧是斯里兰卡檀巴德尼耶王朝第四代君王布伐奈迦巴忽一世去世的年份。他去世后，佛牙被南印度潘迪亚人夺走。也就是说，亦黑迷失到斯里兰卡时还看到了佛牙。大约是三年后才得知佛牙被潘迪亚人夺走，元世祖便派亦黑迷失去马八儿“取”，其矛头所指的马八儿国，正是潘迪亚王朝。然而就在这一年，布伐奈迦巴忽一世的侄子波罗迦罗摩巴忽三世（1287~1292年在位）继位，他与潘迪亚人关系良好，使他们归还了佛牙^②。这就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忽必烈派亦黑迷失去“取佛钵舍利”是想据为己有，二是并不见得是想据为己有，而是迫使潘迪亚人归还佛牙给斯里兰卡。

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若真有此事，《元史》似不应遗漏，但亦不似向壁虚造。真相如何，尚待考辨。

3.汪大渊

汪大渊（约1311~约1350年），字焕章，江西南昌人。他自幼聪明好学，喜欢游历，足迹遍天下。汪大渊至泉州，见中外商人所带来的异域风情和稀奇物品，心生好奇与向往，遂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随商船从泉州出海航行，先

^① 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215页。

^② 帕特里克·皮布尔斯著，王琛译：《斯里兰卡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37页。

后到达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亚、中东、北非等国家和地区，元统二年（1334年）夏秋间返回。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年）返回。此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整理海外见闻笔记，于1349年撰成《岛夷志略》一书。书中对南亚各地记载颇详，对了解元朝与南亚的海上文化交流极有帮助。其中关于斯里兰卡地理和风物的记述，内容十分珍贵，为元代中斯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

《岛夷志略》有《僧加刺》条，重点记叙了当地的佛教信仰、佛钵和红宝石特产。又有《高郎步》条，乃今科伦坡，是中国人关于科伦坡的最早记录。文中亦说“地产红石头，与僧加刺同”。又有《千里马》条，有学者以为即今之亭可马里^①，其地产肉桂、翠羽、百合、萝菔。又有《大佛山》条，说“大佛山界于迺里（今加勒）、高郎步之间”。有学者指出，其地在今卡卢河口之卡卢特勒。^②汪大渊于至顺庚午（1330年）十月十二日到达此地，之所以记得如此具体，是因为他于此日获得了一件“千载一遇”的宝贝：“是夜月明如昼，海波不兴，水清彻底，起而徘徊，俯窥水国，有树婆娑。”遂请人入海采之，“则柔滑，拔之出水，则坚如铁。把而玩之，高仅盈尺，则其树槎牙，盘结奇怪，枝有一花一蕊，红色天然。既开者仿佛牡丹，半吐者类乎菡萏”。这究竟是何宝贝？苏继庠先生以为“殆指珊瑚”。^③根据现代资料，方知“在斯里兰卡沿海，五彩缤纷的珊瑚多达140种”，其中一种为“花状珊瑚”，并有图为证。^④汪大渊将此宝带回国，以为传世之珍。也可视为斯里兰卡花状珊瑚传入中国的明文记载。

至此，我们知道，《僧加刺》条乃是关于斯里兰卡的总述，而另外三条则是对其主要港口的记叙，其中还包括迺里。这说明，中国的商船经常在这些港口停泊并从事贸易活动，也说明这些港口都是当时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

4. 伊本·白图泰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68年）于1333年经中亚地区进入印度，在德里苏丹国图格里克王朝的宫廷为官，后又被任命为特使出使中国。他著有《游记》一书，通常被称为《伊本·白图泰游记》，详细记叙了他在中亚、南亚和中国等地的旅行经过。尽管人们怀疑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但他在南印度沿海所见的情况，很多都与《元史》《岛夷志略》中的记载相符。他记叙喀里古特

①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9页。

② 同上，第312页。

③ 同上。

④ 江勤政：《印度洋明珠：斯里兰卡》，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城 (Calicut, 《岛夷志略》之古里佛, 明代称为古里, 今称卡利卡特, 在印度西南海岸) 说: “中国、爪哇、锡兰以及兹贝·埋赫勒人 (指马尔代夫人), 以及也门、波斯人都至此地, 真是各方商人荟萃之地。”^①接着他还详细介绍了中国船只的大小、帆数、水手、造船地点 (广州和泉州)、造船方法、船内设备等。这说明, 卡利卡特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交汇点, 把中国和锡兰联系在一起, 也把泉州和丝路联系在一起。

伊本·白图泰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斯里兰卡人, 也不像马可·波罗那样充当元朝的使者到访过斯里兰卡。他只是作为印度德里苏丹国的使者, 游历了从斯里兰卡到中国海上丝路。

我们有理由怀疑伊本·白图泰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因为他对中国的许多描述都不准确或者显得过于夸张。但我们也很难否定他到过中国, 因为他叙述的基本情况符合事实, 也可与《马可波罗游记》的相关记载相印证。

他从喀里古特城出发, 先至南印度西南海岸的奎隆, 然后乘船南下, 在马尔代夫逗留, 再于1344年乘船到达锡兰。^②据汉译本《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 锡兰岛上的苏丹 (国王) “名叫舍凯尔斡提^③, 是海上一大苏丹, 我有一次在埋尔贝尔 (Malabar, 在印度半岛南端西侧) 见到他的大小船舰有百艘。当时在港口内有苏丹派往也门的船舰八十艘”。^④

伊本·白图泰讲述了他在锡兰见到的民俗风情, 尤其叙述了那里的特产宝石, 以及锡兰山上的名胜圣人足迹。他按照穆斯林的传说记载道: “珍贵的足迹, 是我们的始祖阿丹先知留在一块黑石上的脚印, 那石头位于一广场内。先知的脚踏进石内, 脚印处显得低凹, 长为十一拏, 中国人于古代曾来此地, 将石上的大拇指 (趾) 连同左近的石头切去, 将它安置在刺桐城的一座庙中, 供边远人士参拜。”^⑤不管这个传说的可靠性如何, 它至少把锡兰山上的圣人足迹与泉州联系在了一起。

伊本·白图泰离开锡兰后又回到印度半岛南端, 然后去了孟加拉, 又从那里出发, 到达爪哇和苏门答腊。在经过几处港口和城市后, 他终于来到中国。他慨叹中国的地大物博, 称赞中国的民俗和经商安全, 尤其对中国的瓷器、纸币、烧煤、绘画等感兴趣。泉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

① 伊本·白图泰著, 马金鹏译: 《伊本·白图泰游记》,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481~491页。

② 锡兰, 阿拉伯人称斯里兰卡为 Silan, 称锡兰山为 Sirandib。《伊本·白图泰游记》汉译本译锡兰山为“赛兰底下”或“赛兰底布”, 为梵文 Simhadvipa 或巴利文 Sihadipa 的变音。

③ 舍凯尔斡提, 梵文 cakravarti (转轮王) 的音译。

④ 伊本·白图泰著, 马金鹏译: 《伊本·白图泰游记》, 第514页。

⑤ 同上, 第519页。

桐城……这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舫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他还描绘了广州，说“此地出产瓷器，亦在刺桐制造”“隋尼克兰（广州）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内地和印度、也门”。^①

（二）物资交流

1. 中国物产

元代，中国输入斯里兰卡的物产，既有丝绸及丝制品，如伊本·白图泰所说，泉州一带出产的锦缎和绸缎，也有粗细瓷器，如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所说广州和泉州等地所生产者。这都是中国的传统产品，早已享誉海外。

《岛夷志略》在介绍南亚诸地的情况时，常常要提到当地的土产，同时还要提一笔“贸易之货”。“贸易之货”反映了当地的爱好和需要，其中常常有丝绸之类，如“五色绸缎、锦缎”“诸色缎”“南丝”“细绢”“五色绢、青缎”“苏杭五色缎、南北丝、土绸绢”“五色绸缎、青缎”等等。《岛夷志略》所记与南亚诸国的“贸易之货”中，又常常有瓷器，如“青白瓷”“青器”“粗碗”“青白花瓶”等等。

另据现代考古发掘，属于元代的瓷器在斯里兰卡亦有出土。如前文提到的克格拉镇南一个小村落，曾发现了“十四世纪前后的越窑系瓷碗的残片”。^②还有雅帕护瓦遗址，也曾发现元代的陶瓷和铜钱。据报道，1975年斯里兰卡考古工作者在斯里兰卡西北部的台曼（泰曼）发现了一大批中国古代陶瓷碎片，据鉴定系12至16世纪的制品。

斯里兰卡学者也曾指出：“斯里兰卡没有发现大量元朝的陶瓷，只有在古城波罗纳鲁瓦（Polonnaruwa）和雅巴忽瓦（Yapahuwa）两地发现的青白瓷证明当时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佛教交流关系。”^③

《岛夷志略》还记载了当时中国输入南亚的手工制品有紫粉、木梳（牙梳）、鼓板、鼓、瑟等，以及金属制品“铁器”“铁条”“铁鼎”“针”等。其中一部分销售到斯里兰卡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2. 斯里兰卡物产

斯里兰卡的传统产品为珠宝、香料和药物等。

据《元史》之《世祖本纪》《成宗本纪》《仁宗本纪》等记载，元代南亚诸

^① 同上，第 551、552 页。

^② 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第 132 页。

^③ 贾兴和：《斯里兰卡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以出土中国陶瓷器为中心的研究》，第 9 页。

国来“贡献”的方物有：象、犀、花驴、花马、水牛、土彪、黑猿、黑狮、珍珠、指环、缣缎、番布、铜盾、鞍勒、毡甲、药物等。这些是确切可知由南亚或经由南亚传入中国的物产。其中大象、水牛、珍珠、药物等应是斯里兰卡的特产。

《大德南海志》记载了元代初期广州市舶司对外贸易盛况，有海外舶来的货物表，分八类：“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和“杂物”。这些货物都是运到中国来的，其中有一部分产自斯里兰卡。《岛夷志略》和《异域志》的记载可以与此相对照。《岛夷志略》是按国家或城市（包括港口）记载南亚物产的，其中甸子、鸦忽石、兜罗绵、木绵花、青蒙石、犀牛角、胡椒、珍珠、玳瑁、槟榔、椰子等应当也是斯里兰卡特产。《异域志》记南亚物产有“异香、龙涎、珍珠、玻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没药、血竭、阿魏、苏合香、没石子等货”，也多为斯里兰卡物产。

四、研究中斯文化交流史的历史意义

首先，10~14世纪中斯文化交流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也是其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宋元间中斯文化交流，对于海上丝路史（包括海上交通史、古代中国科技史等）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其时海路航线的通畅，为后来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铺平了道路。郑和是海上丝路文化交流中的第一伟人，他之所以能够创造七下西洋的奇迹，与前人的航海积累有密切关系。因此，郑和的壮举可以视为宋元海上丝路文化交流的合理而必然的延续。

斯里兰卡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起到了沟通东西方交流的作用。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始终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感。中国和斯里兰卡友好交流的历史作为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丽]